

◎在场

沿着铁轨延伸的目光

□ 范稳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从去年到今年春节，我身边的人出行，又多了一个选择：要不要坐高铁呢？那话里带着一种终于赶上了时尚的自豪和骄傲。作为西南边疆省份的云南，进入高铁时代比中东部地区晚了5到10年。2008年当中国第一条高速列车在京津城际铁路上飞驰时，我曾经想过，我们云南高原的那些大山，能跑火车已属不易，高铁时代，大约与高原无缘。

我的父亲在铁路上干了一辈子，我小时常伴着火车的汽笛声入眠，也常沿着铁路线行走，看两条乌黑的钢轨延伸到天边，把一个少年的想象带到未知的远方。到我成为一名作家后，我为一条神奇的铁路写过一部小说《碧色寨》，它既是圆我少年时期的梦想之作，也是沿着一段即将废弃的铁轨，逆行到时光纵深处的历史回眸。

云南山高谷深路难行，却是中国最早通火车的地区之一。“云南十八怪”中有一怪叫“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说的就是建成于1910年的滇越铁路（昆明至越南海防），它比中国的第一条铁路京张线晚通车一年而已。但这是一条用苦难与尸骨铺就的铁路，它不仅是一段传奇，还有一段屈辱的历史。

众所周知，19世纪中后期，中国封闭的大门大都是被坚船利炮轰开的，而中国南疆的一道大门是被法国人“用火车头撞开的”。说此话的是一个叫奥古斯特·弗朗索瓦的法国人，他有一个文气十足的中国名字“方苏雅”，是那个时代到东方来冒险的代表人物。一百多年后，他当年在云南拍摄的一批老照片被重新发掘出来，成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和云南的珍贵影像资料，这也许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而他来云南，可不是为了拍几张照片那么简单。

1889年底，方苏雅出任法国驻云南府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中国的铁路由外国人来决定修与否，在那个年代是涉及民族自尊心的敏感问题，也是老迈腐朽的大清王朝在面对西方列强瓜剖豆分的无奈之举。清史载：“自中日战后，外人窥伺中国益亟，侵略之策，以攫办铁路为先。”俄国、英国、德国、葡萄牙、日本、法国，这些新老列强均“以铁路为侵略中国之大略也”。

1883年，法国将越南吞并为殖民地，南中国直接面对好斗的高卢雄鸡。1885年第二次中法战争打响时，大清帝国的军队难得一胜，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大胜法军。但那



时的中国既输不起，也赢不起。胜利的一方竟然要求“乞和”，战败者却要求“赔偿”，数额高达25亿法郎，如果中国不允，则“必须给予别项，即中国或允由东京（越南河内）至滇省添造铁路，并允滇省通商所造铁路之费……如不照办，则兵至北京”。近代史家就此评说道：第二次中法战争，法国“不胜而胜矣”。

滇越铁路就此成为中法两国政府角力的一颗棋子。对于清政府而言，它是妥协、无奈的屈辱之物，而对法国人来说，它是插入南中国的一根吸血管。一个曾经多次深入到西南各地考察探险的法国殖民官戈蒂叶勒蒙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让我们有一个进入中国的大门。火车将从云南驶入四川，在另外一个方向，在西藏的南面，我们的铁路将穿过各个高原。”在19世纪末，法国人已经为中国的铁路做了20世纪到21世纪的规划。

方苏雅就是带着法国人这种趾高气扬的心态来到云南。他身材挺拔，目光犀利，蓄着浓密的八字胡，且随时保持它们高高地向两边翘起，让任何一个见到他的中国人都能感受到这个洋大人的傲慢和威严。他到处旅行，经常被人围观，甚至有人因此而被挤下道路、掉进河里。当然他也会受到敌视，遭遇过不知从何处飞来的石头的“欢迎”，但方苏雅认为那不足为惧，他写道：“谁也不会这样去想：‘我们这儿有两三千人，还对付不了一个洋人？来吧，咱们先踩死他！’”方苏雅面对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就像法兰西帝国在中国大海门口的军舰，面对中国的人群，态度要果敢干脆，决不容忍任何欺辱，任何顶撞。方苏雅当年在中国的旅行，正如法国人在云南修的这条铁路——傲慢加霸道。1903年，中法两国签订《滇越铁路章程》，主要内容为：中国允许法国从云南河口到

昆明修筑铁路，法方全额投资（工程概算7000万法郎），清政府无偿提供土地，80年后，若铁路公司收入能抵偿投资和股本利息，中方才可收回路权。以上条款如中国不答应，法国则“兵戎相见，派舰重办”。

左一个“兵至北京”，右一个“派舰重办”，一条国际铁路就这样于1903年秋季匆忙开工。20多万劳工从河北、天津、广东、广西、四川、山东、福建等地招募而来，这些外省人来到南疆的热带丛林和高山峡谷中开山筑路，甚至连身上的长棉袍都来不及更换，就被驱赶到西南各地考察探险的法国殖民官戈蒂叶勒蒙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让我们有一个进入中国的大门。火车将从云南驶入四川，在另外一个方向，在西藏的南面，我们的铁路将穿过各个高原。”在19世纪末，法国人已经为中国的铁路做了20世纪到21世纪的规划。

作为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的代表，方苏雅根本无需考虑修筑这条铁路的代价，在铁路勘测期间，他数次徒步考察了沿线的地形地貌，云南高原切割纵深的地貌让他深为惊叹，“铁路修在什么鬼地方啊！”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他可能更心疼他的坐骑，他写道：“对这些牲口来讲，这是些什么路啊！可以说它们每天都要在泥坡上攀爬埃菲尔铁塔四五次。”

牲口如此，人何以堪；修铁路，又更何以堪。

1910年，大清王朝已摇摇欲坠，滇越铁路却在法国人的欢庆中竣工通车。当插着法国三色旗的火车开到昆明那一天，共和国开国元帅朱德的恩师、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督学（校长）李根源先生带领学生来到昆明火车站，并非是列队迎接，而是给学员们上一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场课。许多血气方刚

静，心如止水，时光未央，岁月静好。假期的前六日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然溜走，到了第七天，想起明天又要开启日复一日的机械模式，不禁有些惶惶然，如此静好的日子又要等到下一个长假才能享受了。

我这样的春节长假百分百应归于最没有“年味”一类了。

的确，这几年关于所谓“年味”的各种议论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归结起来无非就是伴随着生活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以往那种浓浓的年味反而越来越淡，话里话外透出的则是几分哀怨。百姓如此，一些所谓民俗专家也不例外，就连都市里是否有必要燃放烟花爆竹也都和“年味”这类貌似关于“文化传承”的重大话题勾联在一起。

话题一旦重大，就难免引发联想。扯了半天，啥叫“年味”啊？我相信：除却某些“砖家”的故作深沉卖弄“学问”外，民间的感受虽不尽相同，但也不难找到一些共同点。

以本人这类年过花甲者为例，我们曾经感受过或意识中的“年味”无非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可能穿上一年中难得一见的新衣、吃到一年中难得一吃的食物，兜里可能揣上几个平日常没有的压岁钱，一年中亲戚朋友间难得地串来串去，再就是街面上难得地多了些灯笼彩带、鞭炮声响等喜庆的元素，当然也还有祭祖思亲等仪式。

如果以上描述尚还有些代表性的话，那不妨再顺着往下作进一步概括：这些个构成“年味”的物质



的学员泪流满面，怒火中烧。一些人在铁路沿线用石头去砸火车。法国人在当时并没有看到火车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振奋，他们看到的是冷漠、不解、迷惑甚至仇视。任何新生事物来到一个地方，从一列火车到一种信仰，如果它不是和平地到来，不是平等的交流，不是抱着相互尊重的愿望，而是靠强权和武力强制输入，民族情感总是让那些没有看到过山外世界的当地居民难以咽下这枚“文明”的苦果。

接受新事物总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甚至一些人还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对勤劳聪慧的中国人来说，一旦他们认知了解到某个事物，他们的学习借鉴能力便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上世纪初，因为有了这条铁路，在滇南一线，海关、邮局、电影、洋行、商号、股份制公司以及日进斗金的工矿企业，已经在这片闭塞的土地上悄然兴起。铁路改变了这片封闭高原的生活方式，更带来了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1915年，云南人开始修筑自己的铁路，那是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从铜都个旧通往滇越铁路的特等大站碧色寨，但它不和法国人的米轨铁路接轨，因为这条铁路的轨距只有60厘米。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提防。

再难辽阔远的高原，也总有一条路，把它和世界联接起来，从茶马古道到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我们所要应对的变化，几近于一场美丽的梦幻。虽然现在“慢生活”成为一种时尚，但谁又愿意在旅程中花去枯燥乏味的漫长时光呢？一个希望徜徉在滇池湖畔享受湖光山色的旅游者，一定不会拒绝一趟朝发夕至的高速列车。

再来提一提那个远去的背影。1906年，方苏雅因为任期已满，回到了法国。他把自己的住宅建成一座中式风格的庭院，取名“小中国”，经常穿中式服装、喝中国茶。他对在中国的阅历依然念念不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要是这些人对我们无私的想法不是那么反感，不是那么明显地拒绝，而是对我们天才的设想予以充分利用，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优势。他们则完全可以把他们的国家改变成一个干干净净、光辉灿烂、鲜花盛开的中国。”

方苏雅的忧虑和展望，当然是站在一个西方殖民者文化优越感的立场上来看我们这片高原。他或许称得上半个预言家，他所代表的那种“优势”，对于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存在，而“鲜花盛开的中国”，则已然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

要素大抵都产生于农耕时代，因其经济的短缺而引发；由于一年仅此一回，所以就稀缺；由于稀缺，就显得珍贵。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构成“年味”的精神因素本质上就是一种期待。

如果以上概括大抵不谬的话，那关于“年味”是否越来越淡、“年味”是否应该有一定之规之类的争论几乎都成了一堆伪命题。农耕时代、经济短缺时代已成为历史，意味着构成过往所谓“年味”的物质基础已不复存在。至于“期待”倒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常态，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物质条件下期待的指向一定会有不同，甚至是巨大的差异。

至此，问题变得简单起来。春节，作为已传承4000余年的一种中华文化民俗是不会消失的，但“年味”的内涵一定是不同于以往的了。事实上它从来也都是在流动变化着，即便是在当下，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年味”的理解一定各不相同。今天，又有多少人还会期待那曾经一年一次的“美味佳肴”和“锦衣玉佩”呢？又有多少人会在意那曾经一年一度的“灯红酒绿”和“鞭炮轰鸣”呢？

话再说回来。曾经的期待已然逝去，期待却永恒！所不同的只是逝去的是那种曾经的共同期待，永恒的则是指向迥异的个性期待，或物质，或精神，但有一点或许还是共同的：那就是“春节静好”，只不过各有各的“静好”标准而已。

伴随着春天的甦音，春的气息来临，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拉开帷幕。本版特别推出“两会”代表委员作品专版，约请参加“两会”的作家代表委员激扬文字，书写对时代生活的感受与思考，以飨读者。

——编者

(本版人像素描均由罗雪村绘)



刚刚读到一篇朋友的文章，说非常欣慰北京春节燃放烟花，自己除夕夜的好觉没有被零点钟时的炮仗吵醒。又想起昨天才读到一位文化学者的感慨，说年味儿的淡化是传统文化的缺失。都是很有想法的人，过着同样的年，感受和评价却如此不同，这直接让人想到一个问题，春节文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观念纠缠。烟花爆竹是春节期间最突出的“文化标识”了，近十多年来却遇到了消防安全、空气质量等要求方面的打压，成为最不受欢迎的节日行为，一些大城市尽管在禁、限、放方面有反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燃放。欢欢喜喜过大年，是要越热闹越好的年味儿，还是要难得的几天安静悠闲？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两个春节，一个是记忆中的热闹却也嘈杂的节日，一个是努力创造或希望得到的一周安静时光。

鲁迅小说《祝福》的开头这样描写鲁镇上的春节气氛：“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写得逼真了，闻到空气中的“火药香”，就会联想到过大年，我们都有这样的记忆吧。然而今天却早已大不相同。改革开放，全球化，世界眼光，移风易俗不可避免。生活水平提高，城市化，繁忙一年后难得的休息日，调整春节的过法势所必然。我还是孩童的时候，春节是许多人多热切为前提，临近春节，越来越密集的爆竹声就是节日到来的信号。然而这些景象今天已经快要被说成是陋习了。现在的中国孩子，一年四季不用为吃饭穿衣发愁，不再期盼过年时穿新衣，吃美食。家里老人准备那么多大鱼大肉，且不说是吃不动、吃得消，光是讲究吃新鲜、吃清淡的新观念，就与传统的节日气氛相抵触。我还记得，大约30年前，一到春节，报纸上都会有各种漫画和知识提醒，告诫人们春节期间一定要防止暴饮暴食，避免因过度饮食而得病。如今呢，“每逢佳节必吃多”似乎变成了对影响身材的担忧，角度已经完全不同了。

由于我们是在一个全面开放、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过着传统节日，所以我们心中的两个春节时有纠缠和冲突。春节是回家和亲人团聚的日子，如今也成了外出旅游的时机。然而临近年根儿，火车票、飞机票一票难求，旅游景点、大小庙会人潮汹涌。能赶上这场热闹的既有喜悦也有烦恼，没赶上路上的既有惆怅也有欣慰。大家在各得其所却又互相羡慕。这真是非常有趣又非常矛盾。究竟以怎样的方式过年才是最好，莫衷一是，甚至自己内心就没有做好决定。观念的纠缠既是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与同一个人的内心。于是我们经常会遇到同样一个人，表达着对两种不同过节方式的同等认同，而之所以如此认同，是因为自己并没有如此体验过。遇到从乡下老家回来的同事，就会赞叹还是回农村过年好，有年味儿，城市里已与平日无异。遇到从海外度假回来的朋友，又会夸人家洒脱，可以过一个享受

自在的年。然而，那些度假回来的朋友听到别人一整个春节都宅在家里，既不应酬也不乱逛，只是悠闲看着日出日落，又会感慨，年就应该这么过，跑出去看人山人海，真不如在家里发呆。其实，呆在城里的人不知道，即使是在鲁镇那样的乡下，如今放鞭炮的也渐渐少了，北京的三环外定时定点还可以燃放，但今年几乎听不到悠远的爆竹声了。从乡间或从海外回来的人不知道，宅在单元房子里的人，其实每天抱着平板电脑或手机，早已看完了《蓝色星球》等纪录片，他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并因此做出了环游世界的计划。

春节文化的观念纠缠远不只是放不放爆竹的问题，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压岁钱都不用准备新钱的时代，虚拟的和现实的，独处的和群聚的，外出的和宅家的，加班的和娱乐的，在家包饺子和用手机订餐的，平起平坐，各自选择。在图书馆看书，在电影院看片儿，逛书店，逛庙会，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远到天涯海角和家人视频狂聊，欢乐处处有，节日多样多。看春晚和不看春晚已经不是春节文化的观念差异，在差异中同乐，在自主选择中互相赞叹才是主流。传统佳节和现代生活在交叉中的交融，势必成为今后更长时期内人们的过节乐趣。对一个具体的人或其家庭来说，今后交替选择不同的方式体验过年的旧风俗和新感觉，或许是个不错的想法。



□ 阎晶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春节文化的观念变迁

岁月静好

□ 潘凯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



自打双亲大人辞世后，心中的“老家”仿佛瞬间消失，春节长假我就不再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居住地北京，刚刚来临的戊戌年也不例外。

北京戊戌年的除夕夜格外安静，没有了以往那种此起彼伏、震耳欲聋、贯穿彻夜的鞭炮轰鸣。由此换来的则是这个时段北京PM2.5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01微克，比去年同一时段每立方米426微克的平均浓度下降了225微克，降幅达52.8%，而这还只是在五环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结果。

这个戊戌年的春节长假我的生活基本就是一个“宅”字。平日里喧哗不已的小区在这几天突然显得十分安静，难得一见的空车位在这几天中也不再那么稀罕。热闹的京城此时竟仿佛成了一座空城，如此氛围更是给自己的“宅居”平添了几分静谧。

“宅居”中的本人生活也十分单调，除了操持比平日略为讲究一点的一日三餐和比平日稍多一点的睡眠外，其他时间就是安安静静地看书、安安静静地码字。恬淡宁